

# 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现状

杨雪, 刘瑜\*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051)

**摘要:**丝绸之路是世界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欧、非3大洲的文化大动脉。丝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频繁密切的服饰文化交流互动,促使中国服饰文化在传承、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因子,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面貌。通过对“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丝绸之路的概论性、整体性的研究,并呈逐渐拓展趋势,服饰艺术、文化开始受到关注;近30年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更加多元化,并可分为通论性、专题性、案例性3种主要研究类型。但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散点出现,有“重纺织、轻服饰”“重陆丝、轻海丝”的现象,系统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服装史论专著暂付阙如。

**关键词:**丝绸之路;服饰;艺术;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J 53;G 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19)04-0347-08

##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Art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stumes Along the Silk Road

YANG Xue, LIU Yu\*

(School of Fashion and Art Desig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The Silk Road is the earliest cultural artery connecting the three continents of Asia, Europe and Africa in the ancient world. The frequent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of costume cultures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has prompted the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to present a new look in the past due to the absorp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heterogeneous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ilk Road costume art exchang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re mainly about the overview and integrity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clothing art and culture began to attract attention; the recent studies on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Silk Road became more divers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othing, and the stud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research types: general theory, special topic and case. However,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ultural exchange on th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tume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mostly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papers at present. Systematic research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Silk Road, costumes, art, cultural exchange

丝绸之路被誉为“两千年来始终主宰人类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其海陆通道曾经是整个世界

神经中枢。中国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在相当长的历史

收稿日期:2018-10-21; 修订日期:2019-05-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73)。

作者简介:杨雪(1989—),女,博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刘瑜(1970—),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服饰设计文化比较、时尚媒体与传播、时尚文化产业等。Email:liuyu32@dhu.edu.cn

时期内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交织出璀璨的丝绸之路服饰文明。近年来,对丝绸之路艺术的研究成为了中国社科类学术研究新热点,“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是丝路研究和服装史论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文中拟结合国内外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作以梳理和评述。

## 1 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现状

丝绸之路是世界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欧、非3大洲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大运河”。但正式命名其为“丝绸之路”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历史地理学家 RICHTHOFEN F V R<sup>[1]</sup>首次提出,他将古代中国从长安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网络称为“丝绸之路”(即德语“die 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译成英文版本后,“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这一代称被广泛使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国学大师饶宗颐<sup>[2]</sup>提及。

在汉语中,“丝绸”一词是“由含蚕丝纤维织成的纺织品的总称”,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蚕丝纤维”“丝线”“丝绸面料”及最后的“蚕丝面料制成品”。作为商品或者流通货币的“silk”(丝绸纺织品),在经由海、陆丝绸之路的运输、交换、行销之后,大多会被进一步加工处理,最终成为穿在人身上的服饰,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们从物质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广义的“服饰”意指装扮身体所用具体可见物品的总称,包含穿衣服、佩戴饰品、美容化妆等。丝路沿线各国的服饰艺术交流,不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和艺术借鉴,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动因,体现出一定区域族群内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集中了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史置于丝绸之路视域下进行观察,可以清晰发现:正是由于丝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频繁密切的服饰文化交流互动,促使中国服饰文化在传承、发展、演化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吸收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因子,使中国服饰在形制、款式、面料、纹样等方面都呈现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是丝路研究和服装史论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

由于以往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服装史多注重

对本土服装的断代研究、民族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普遍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自“The Silk Road”的概念提出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已成显学,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等建设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国内外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关注度直线攀升,学界也迎来了丝路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机遇与新热潮。

笔者检索了中国知网有关论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丝绸之路各类综合研究成果论文信息24781条(1972—2018);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条(1985—2018);丝绸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条;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成果193条(1981—2018,1981年前未见);丝绸之路纺织研究成果81条(1997—2018);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研究成果10条(1997—2018);而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相关研究成果仅有5条(2011—2018)。尽管以上统计存在一定误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研究成果虽多,而针对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专门研究尚未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

## 2 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饰”和“文化艺术交流”的内容可知,自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丝绸之路服饰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铺垫阶段,其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完成对丝绸之路概论性、整体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较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鲜有发表;②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丝路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拓展,出现了更多断代史类研究和专题、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发表量开始持续上升,服饰的国际化交流研究开始被学界注意,比较性研究类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2)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崛起阶段,其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相关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迎来了全新的学术契机,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 2.1 早期丝路历史研究成果中有关服饰和对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来,中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俄

国、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陆续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着丝路研究的国际视野。早期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较的研究论著中,一些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服饰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为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流进行了铺垫。

自1877年 RICHTHOFEN F V 提出“丝绸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发掘中亚腹地地理历史的探险热。RICHTHOFEN F V 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先对“丝绸之路”沿途诸国,特别是对中国新疆、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地理历史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自19世纪末开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尔、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及中国新疆、甘肃等进行了4次考古探险考察,重点研究了丝绸之路葱岭古道一线,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等详细记述了他的探险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图记》<sup>[3]</sup>第22章翻译了斯坦因发现藏经洞绘画、刺绣、织物等的详细记录;第24章记录了千佛洞的织物。法国的东方学家保罗·伯希和,于1906年开始前往新疆喀什、图木舒克、阿库尔、克孜尔等地对佛寺和石窟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发现了大批健陀罗艺术品及古梵文、龟兹文写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珍贵绘画3 000多卷,还有大量纺织刺绣艺术品,拍摄了数千卷文献照片。保罗·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注》《伯希和考古文献》等,即便是对当下学者开展古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1975年,日本学者加藤九祚和前岛信次联合编写了《丝绸之路事典》,是亚洲学术史上较早的丝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国学界也陆续出版了多部丝绸之路古代资料汇编类文献,例如张星烺<sup>[4]</sup>集中梳理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往来互动的珍贵文献史料,并对其部分地名和史实加以详述考释,书里汇集了诸多介绍域外国度服饰风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吴丰培编纂的《丝绸之路资料汇钞》、牟实库主编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等,均收录了与服饰相关的资料。

早期“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的专题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对研究丝路服饰文化交流具有极大参考价值的信息。向达<sup>[5]</sup>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sup>[6]</sup>编辑出版的图集有详细的文物介绍,图版质量

较好;冯作民<sup>[7]</sup>对罗马与东方进行纺织服饰贸易交流的详情进行了介绍;日本学者书上诚之助<sup>[8]</sup>对日本古典服用狩狮纹的丝路源流展开详述考证;沈光耀<sup>[9]</sup>在著作中介绍了丝绸之路海上与陆地贸易线路的形成及变迁,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了解丝路贸易历史背景有重要意义;常任侠<sup>[10]</sup>介绍了香料和装饰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写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缪良云的《中国历代丝绸纹样》等,均有论述中外服饰交流背景、轨迹及艺术表现的内容。另外,还有许多零星发表的学术论文,如日本学者高桥健自的《古代遗物所见大陆文化的输入》、陈竺同的《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传说之比较》等,对体现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案例进行了论证分析。

1987年以前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范畴。1987年为了强调中西相遇时所产生的复杂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激发了全世界对丝绸之路的兴趣,也标志着丝路研究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随即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如彭德清<sup>[11]</sup>、庄为玑等<sup>[12]</sup>、姜培玉<sup>[13]</sup>、吴家诗<sup>[14]</sup>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sup>[15]</sup>、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sup>[16]</sup>等学者和单位出版的专著,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服饰交流的海上传播路径及情况展开概述性、整体性的研究。

## 2.2 近30年来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服饰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其所体现的文化对外交流、设计创新等都与中国本土文化软实力建设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30年来,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 2.2.1 通论性研究

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建设推动了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都远超其本意。近30年来,学界有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通论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饰文化的部分。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梳理了丝绸之路公路交通网道的历史文献记述,以及各个时期交通与经济的因果、主从关系的变化情况,对研究服饰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径提供参考<sup>[17]</sup>。李明伟<sup>[18]</sup>从丝路贸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两汉至明清时期中外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和多向交流的相关史实,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服饰商贸活动以及由参与这些活动的外国商人所带来的异域服饰文明提供了直观素材。

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在其专著中介绍了部分丝路沿线服饰史料的相关历史记载情况。例如:杨蕤<sup>[19]</sup>以 10—13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中外历史文献所载中国五代、宋、辽时期诸蕃的朝贡情况和朝廷的回赐情况,对唐、五代、宋时期丝路所贡物品及外来物种进行统计及对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饰品;薛爱华<sup>[20]</sup>引据古代汉文典籍,列举了唐代舶来服装及纺织材料、用以制作服饰品的宝石和金属、丝绸染料和化妆颜彩。

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设和逻辑推演的纯理论研究,它是以具体服饰品对象为物质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样、多层次交互的外延之上,从研究方法到学术视域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对此,刘瑜<sup>[21]</sup>指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宜分作 3 个层次进行推进:①从服饰的物质性角度出发,考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具体的服饰款式、造型、设计、工艺等特点;②研究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服饰穿着体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饰的方式,以及服饰对人体的表现和规训等;③从服饰的社会性角度出发,着重研究各种体现服饰艺术交融的服饰现象与政治、经济、宗教、环境、生产力、艺术审美等社会因素的相关性。

这些通论性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出丝路沿线的异质服饰文化之间具有相互理解、吸纳、互鉴、衍生及创造发展的可能性。开展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探求丝绸之路视域下,服饰装扮这一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行为方式,如何通过这条古代世界东西方之间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条件下相互交流和影响;及“服饰”这一具体艺术形式在丝绸之路所涉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异同和关联。

**2.2.2 专题性研究** 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动性。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饰交流通过款式互仿、纹样互鉴、工艺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无,生成了一系列缤纷且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一些学者对体现在服饰上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丝绸之路敦煌服饰艺术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是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的分支。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敦煌服饰”,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多达 405 条。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地处中原

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中间地带,自古就是丝路上重要的商品贸易和文化集散地,历史上此地居民和往来人员的国别及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敦煌本地服饰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十分明显。

敦煌莫高窟拥有从北朝至宋元时期的壁画、文书、帛画等文化珍宝,其中包含着丰富而珍贵的服饰图像和文字史料。卢秀文等<sup>[22-23]</sup>对敦煌壁画中体现文化交流的服饰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郑炳林等<sup>[24]</sup>从少数民族服饰角度对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过敦煌的少数民族和在敦煌营建过石窟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形象进行了专题研究,所整理的服饰图像及资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鹘、鲜卑、党项、蒙古 6 个少数民族。2016 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总计 26 卷的《敦煌石窟艺术全集》,其中第 23 卷“服饰画卷”按照供养人服饰、世俗人服饰、佛国人物服饰 3 大类,对敦煌石窟的服饰图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sup>[25]</sup>;同类书籍还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谭禅雪编著的《中世纪服饰》。

7—14 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之一。唐朝与海外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 70 余个,与宋元帝国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 140 多个,针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热点较多。

7—8 世纪,是中国唐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期,异域风潮推动了中原服饰审美及款式结构等的变革,引领了当时的服饰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王若诗<sup>[26]</sup>从《全唐诗》的角度切入,通过研读唐诗中对当时服饰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丝绸之路影响下发生的诸如胡服盛行、时世装对胡服元素的吸收、异域舞蹈服饰的流行及民间服饰潮流变迁、新服装材料的引入等服饰新变。马勒 J G<sup>[27]</sup>在其著作中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发现的具有所谓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结合绘画以及文献记载,对塑像的类型、特征、年代、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涵盖了大量胡人服饰信息,对于研究唐时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当时胡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形象有较高参考价值。

10—14 世纪,宋元服饰对胡服元素进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饰体系的新样式。张飏雪<sup>[28]</sup>认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经逐渐融入了宋人汉族服饰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还成为朝廷官服的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饰设计之中;宋代服饰之中的上领、靴鞋、幞头、鈐带均为经过宋人吸收创新之后形成的汉化胡服。李咏<sup>[29]</sup>针对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

服饰演变产生的影响及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纪朝鲜半岛高丽时期与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金文淑<sup>[30]</sup>论述了高丽时期服装中的蒙元元素,讨论了这些服装在款式和称谓上对当今韩国常服的影响。位于伏尔加、顿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纪中叶的服饰和丝织品,兹维思达纳·道蒂<sup>[31]</sup>对这一地区出土的服饰品、纺织品进行了组织结构分析,发现所出土的织物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认为其代表了蒙古时期较高级的丝织工艺水平。

当某种服饰符号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其会逐渐升级成一种社会服饰现象,而每一种服饰现象又可以被分解为具体实物、行为表现。学界对丝路沿线所出现的服饰现象也有很多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对希腊化时期丝路服饰流行“希腊风”现象的专题研究。几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断受到希腊风格东传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独特希腊风艺术,并在纺织服饰品、壁画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体现。艺术史家称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希腊化时期”,也是马其顿希腊文明的“东方化”时期。这一时期希腊艺术文明沿着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在北非和西亚广泛传播。李京泽<sup>[32]</sup>指出,“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为古波斯与古希腊百年来的缠斗划上句号,但却是东西方文明下一轮更强烈的碰撞与交流的开始”。王蕴锦<sup>[33]</sup>对阿富汗希伯尔罕“黄金之丘”(Tillya 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饰配件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属于希腊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饰、龙形飞翼双马神守护国王金垂饰、格里芬混合中国狮虎造型的金扣饰等黄金饰品体现了中国、波斯、西亚、中亚草原等的多元艺术要素,显示了当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技术手段和审美,并反映出深层次的传统文化信仰之间的交流。

被希腊化的西亚人给印度西北部一小块边界地区带来了希腊式佛教艺术,在犍陀罗地区许多服饰都留存有模仿希腊罗马式样的痕迹。希腊文化随犍陀罗艺术继续向东传播,最远一直传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诸国,且在同时期的中国佛教壁画、雕塑中也有体现。早在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就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希腊风格壁画和艺术品。陈晓露<sup>[34]</sup>、赵艳<sup>[35]</sup>、满盈盈<sup>[36]</sup>等对“丝绸之路佛教服

饰的希腊化”这一专题展开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

17—18世纪欧洲服饰流行“中国风”的现象,当时的欧洲服饰艺术表达呈现出对于中国文化极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纳<sup>[37]</sup>针对这一现象考察了从中世纪至18世纪西方艺术家和工匠对东方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表达方式。王洪斌<sup>[38]</sup>从全球史视角出发,以东方奢侈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西进”现象为切入点,对东方文明在英国文明转型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王洪斌认为来自东方的丝绸等奢侈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输进入英国市场,逐渐为英国人所接受,改变了英国人的服饰观念,由此掀起的“中国热”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纺织和服装制造等行业。IMPEY O<sup>[39]</sup>认为“中国风产生于欧洲人对东方的幻想,对相关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对美的关注”。迈克尔·苏利文<sup>[40]</sup>指出:“对18世纪欧洲艺术品味的研究已经表明,当时欧洲人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sup>[41]</sup>对这一服饰现象以及体现当时中国风与巴洛克、洛可可服饰纹样设计相融合的典型实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欧洲人利用中国元素进行服饰表面装饰以追求异国情调的表达,但缺乏对这些元素的深层研究。

透过对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够深切感受到丝路服饰艺术互联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 案例性研究** 除了上述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研究是从服饰品的物质性角度切入,结合文献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考察并分析某一具体服饰品上所体现的丝路文化互动。

韩香<sup>[42]</sup>以波斯锦与锁子甲为例,指出这两样物品均产自西亚波斯一带,是随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展开,传播并且影响到内地的服饰文化。陈习刚<sup>[43]</sup>以唐代胡腾舞者“葡萄长带”的服饰装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葡萄长带”的丝路源流及与宗教间的关系等。赵胤宰<sup>[44]</sup>通过高句丽的“鸟羽冠”捕捉其与丝绸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冠饰材料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古代遗迹中多有发现,赵胤宰认为高句丽的“鸟羽冠”为研究服饰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线索,“鸟羽冠”作为证明当时朝鲜半岛和丝绸之路之间联系的证据,透过它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和古代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情况。茅惠伟等<sup>[45]</sup>针对丝路沿线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多次出现的百衲织物进行研究,采用文献结合实物的方法,从形制与类别、材质与技艺、起源与蕴

意、流变与兼容4个方面,对丝路沿线考古出土、民间使用、文献记载和博物馆收藏的各种百衲织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百衲织物很可能是在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下产生的,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丝路沿线各文明有了复杂联系,各自独立的百衲织物共同朝着形式美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丝路织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sup>[46]</sup>通过对拉萨大昭寺藏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探讨,认为其是吐蕃王朝时期(但在松赞干布统治期之后)藏族艺术家融合西亚、中亚及唐朝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这些服饰品案例看似细小琐碎、零星四散、相互独立,但若将其置于丝绸之路文化视域下进行考察,就能够发现其产生、流行与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些已发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验性探索,提供了多种可以借鉴的研究路径和论证体例,为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打开了新的视野。

### 3 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从国内外已发表的服装史论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于“丝绸之路”上“silk”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蚕丝原材料”和“丝绸纺织品”上,而对“丝绸服饰品”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弱,基础研究呈现出“重纺织、轻服饰”的现象;同时,较之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陆上丝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成果远超海上丝绸之路,系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服饰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鲜见,基础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重陆丝、轻海丝”的现象。

如文中第2节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散点出现,或者穿插在其他学科研究论著的间隙被提及、带过。这些成果为开展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理论支持,但迄今为止,尚缺少图文并茂、逻辑严谨、学理性强的丝绸之路服装史论综合研究体例,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研究领域中比较系统化的服装史专著暂付阙如。丝路沿线许多国家可以用于服饰研究的出土和传世的服饰实物、雕塑、典籍、古代绘画等珍贵资料还没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许多独具丝路特色的服饰文化交流路径和交融历程等尚且眉目不清,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梳

理和完善。

近年来,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已经上升为中国社科类新一轮的学术研究热点,这一领域未来或将形成新型交叉学科——“丝绸之路艺术学”。而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经国和现代世界范围内“一带一路”框架体系建设的发起国,有望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开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学研究新领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未来学界对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纵深方向拓展的趋势。例如以图文互鉴的方式重新发现历史信息间的有机联系并对其进行服装学学理阐释,开展以图像、图解和图示的方式补充国内外现有文字和实物资料的图志研究等。通过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图、文及实物资料,发掘体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饰艺术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各类服饰品与服饰现象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及剖析,加强国际间相关的学术交流,逐步建立起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研究资料数据库,逐步开展按照服饰艺术门类进行的系统化比较研究,逐步勾画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历史图志。

### 4 结语

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课题需要用跨越时空界限的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服饰文化,这将有利于推动国内服装史研究从本土向国际化视野的进一步转化,有利于学界加深对于中国服饰文化和世界传统服饰文明发展历程更为全面的认知。

鉴古知今,通过对历史上丝路服饰艺术互动信息的发现,尝试将丝路服饰品和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服饰现象置于当时的丝路艺术场景与艺术创造语境,以探究丝路服饰相互吸纳、互鉴的艺术及文化渊源,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展示丝绸之路辉煌的服饰艺术交互脉络及其所体现促进世界文明互荣共生的精神意蕴。相信这一研究的推进将会对中国服装史和世界服装史学的研究做出有力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为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当下中国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设计提供更多有益启迪。

#### 参考文献:

- [1] RICHTHOFEN F V R.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M]. Berlin: Verlag von

- Dietrich Reimer, 1877: 454.
- [2] 饶宗颐. 蜀布与 Cinapatta: 论早期中、印、缅交通[C]//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编委会.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广州: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4: 561-584.
- [3] 奥雷尔·斯坦因. 西域考古图记[M]. 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457-464, 498-513.
- [4] 张星烺.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 朱杰勤,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5] 向达. 中西交通史[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 丝绸之路——汉唐织物[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3.
- [7] 冯作民. 西洋全史四·罗马兴亡史[M]. 北京: 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75.
- [8] 书上诚之助. 日本国宝狩狮子锦考证——追溯丝绸之路[C]//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编委会.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 第13辑. 北京: 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 1983: 106-116.
- [9] 沈耀东.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 [10] 常任侠. 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5.
- [11] 彭德清. 中国航海史: 古代航海史[M].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
- [12] 庄为玠, 庄景辉, 王连茂. 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9.
- [13] 姜培玉. 山东经贸史略[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 1989.
- [14] 吴家诗. 黄埔港史: 古、近代部分[M].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
- [15] 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C]. 广州: 广东社会科学编辑部, 1991.
- [16]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1.
- [17] 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M].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0.
- [18] 李明伟. 丝绸之路贸易史[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
- [19] 杨蕤. 回鹘时代: 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20] 薛爱华. 撒马尔罕的金桃: 唐代舶来品研究[M]. 吴玉贵,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21] 刘瑜. 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46(2): 10-16.  
LIU Yu. Study on the cultural exchange of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tumes[J].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8, 46(2): 10-16. (in Chinese)
- [22] 卢秀文. 供养人服饰图案与中西文化交流[C]//霍旭初. 龟兹学研究: 第五辑.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12: 16.
- [23] 卢秀文, 徐会贞. 披帛与丝路文化交流[J]. 敦煌研究, 2015(3): 22-29.  
LU Xiuwen, XU Huizhen. The brocade scarf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long the Silk Road[J]. Dunhuang Research, 2015(3): 22-29. (in Chinese)
- [24] 郑炳林, 谢静. 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 敦煌石窟中的少数民族服饰研究[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6.
- [25] 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艺术全集: 服饰画卷[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
- [26] 王若诗. 论唐代丝绸之路影响下的服饰新变——以唐代诗歌为研究视角[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4(1): 84-88.  
WANG Ruoshi. On the new changes of cloth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ilk Road in Tang Dynas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ng poetry[J]. Journal of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2017, 34(1): 84-88. (in Chinese)
- [27] 马勒 J G. 唐代塑像中的西域人[M]. 王欣, 译.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
- [28] 张飏雪. 胡服的发展及其对宋代服饰文化的影响撮要[J]. 兰台世界, 2015(27): 144-145.  
ZHANG Biaoxue. The development of Hu cloth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lothing culture of Song Dynasty[J]. Lantai World, 2015(27): 144-145. (in Chinese)
- [29] 李咏. 看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演变的影响[J]. 兰台世界, 2015(18): 112-113.  
LI Yong.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n the evolution of clothing in Song Dynasty[J]. Lantai World, 2015(18): 112-113. (in Chinese)
- [30] 金文淑. 十三至十四世界高丽时代服装中所使用的蒙古服装[C]//赵丰, 尚刚. 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香港: 艺纱堂服饰出版, 2005: 297-304.
- [31] 兹维思达纳·道蒂, 顾幼静. 蒙古时期丝绸装饰中的中国、伊朗和中亚艺术传统的鉴别——从术赤·兀罗斯(Ulus Djuchi)出土的黄金部族的遗物来看[J]. 东方博物, 2006(2): 43-49.  
Zvezdana Dode, GU Youj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Iranian and Central Asian artistic traditions in silk decoration in Mongolian period—judging from the remains of the golden tribe unearthed in Ulus Djuchi[J]. Cultural Relics of the East, 2006(2): 43-49. (in Chinese)
- [32] 李京泽. 希腊文化在希腊化远东方艺术中的融入与失落[J]. 美术, 2015(8): 124-128.  
LI Jingze. The integration and loss of Greek culture in the Greek ancient art[J]. Arts, 2015(8): 124-128. (in Chinese)



- [33] 王蕴锦. 从“黄金之丘”服饰配件艺术探究丝绸之路多元因素[J]. 艺术设计研究, 2018(1): 53-58.  
WANG Yunjin. Research on diversification factors of costume accessories in "Tillya-tepe" on the Silk Road [J]. Art and Design Research, 2018(1): 53-58. (in Chinese)
- [34] 陈晓露. 从伎乐供养人图像看希腊化对佛教美术的影响[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7(4): 105-118, 161.  
CHEN Xiaolu. On the influence of Greek on Buddhist art from the image of the provider of gigaku [J]. Palace Museum Journal, 2017(4): 105-118, 161. (in Chinese)
- [35] 赵艳. 渗透与浸染: 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因素[J]. 青海民族研究, 2017, 28(1): 208-212.  
ZHAO Yan. Penetration and dyeing: Greek factors in Gandhāra art [J]. 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 2017, 28(1): 208-212. (in Chinese)
- [36] 满盈盈. 犍陀罗艺术及其东传龟兹考[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178-181, 188.  
MAN Yingying. On Kandaharo arts and its oriental spread into Qiuci [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3(3): 178-181, 188. (in Chinese)
- [37] 修·昂纳. 中国风: 遗失在西方 800 年的中国元素 [M]. 刘爱英, 秦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38] 王洪斌. 全球史视野下的东方奢侈品消费与 18 世纪英国社会[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9(6): 147-149.  
WANG Hongbin. Global historic view of the iuxuries consumption from the eastern world and the British society in 18th century [J].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39(6): 147-149. (in Chinese)
- [39] IMPEY O. Chinoiserie: the impact of oriental styles on western art and decor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53.
- [40] 迈克尔·苏立文. 东西方艺术的交会 [M]. 赵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41] 袁宣萍. 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设计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 [42] 韩香. 波斯锦与锁子甲——西亚文明在陆上丝绸之路的传播 [C]//敦煌研究院. 敦煌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兰州: 敦煌研究院, 2018.
- [43] 陈习刚. 唐诗中“葡萄长带”与宗教及相关问题探讨 [C]//敦煌研究院. 敦煌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兰州: 敦煌研究院, 2018.
- [44] 赵胤宰. 略论高句丽鸟羽冠与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 [J]. 西部考古, 2017(3): 216-233.  
ZHAO Yinzai. On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Koguryo bird crest and Silk Road [J]. Journal of Western Archaeology, 2017(3): 216-233. (in Chinese)
- [45] 茅惠伟, 徐铮. 丝路百衲织物的比较研究 [J]. 丝绸, 2018, 55(2): 76-81.  
MAO Huiwei, XU Zheng. A compare research on the patchworks of the Silk Road [J]. Journal of Silk, 2018, 55(2): 76-81. (in Chinese)
- [46] 阿米·海勒, 杨清凡. 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 (7 世纪至 9 世纪) 银器及服饰考察 [C]//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藏学学刊(第 3 辑)——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卢杰)